

從人口增長論蘇聯中亞回教民族問題

謝天士

蘇聯悍然進兵阿富汗，有的學者稱之為進一步擴張的表現；有的則認為蘇聯南疆的混亂、不穩和泛伊斯蘭運動對它是個威脅，因為蘇聯境內回教民族的數量，佔世界第五位。一九七九年，蘇聯先作十年來的人口普查，然後進兵阿富汗，兩者的相關性有多大呢？回教民族此一內在因素對蘇聯在阿富汗的軍事冒險影響程度究竟如何呢？研究中亞民族問題無疑有助於對上述問題的了解和判斷，畢竟中亞居住着蘇聯境內絕大多數的回教民族。

一、中亞回教民族之特性

中亞是指伏爾加河、高加索和中國大陸邊疆之間的這塊土地，十九世紀下半葉，被俄羅斯人完全佔領，並施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儘管中亞後來被蘇維埃政權硬性地分為五個「加盟共和國」（即烏茲別克、哈薩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和塔吉克五共和國），但是這裏的原始居民還是繼承回教文明的傳統。除了塔吉克人說波斯語之外，其他四民族均屬土耳其語系。

一九七〇年蘇聯人口普查時，曾列舉二十二個具有回教文化傳統的民族，依人口數目多寡排列，前七名是：1. 烏茲別克人，約九百二十萬人；2. 韃靼人，約五百九十萬人；3. 哈薩克人，約五百三十萬人；4. 阿及利人，約四百四十萬人；5. 塔吉克人，約二百一十萬人；6. 土庫曼人，約一百五十萬人；7. 吉爾吉斯人，約一百四十五萬人^①。除韃靼人和阿及利人之外，其餘五個民族

註① Brian D. Silver,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Linguistic Russification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in Jeremy R. Azrael, e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raeger, 1978), p. 302.

均為中亞回教民族，其總數為一千九百六十萬人，佔所有蘇聯回教民族的百分之五十七。他們大都是遜尼派回教徒。必須說明的是，他們之中有些人可能已成為無神論者，有些人則不一定是回教的忠實信徒，但中亞的居民，只要他是曾信奉回教的人，都一律被稱為回教徒^②。

由於蘇聯的南疆純粹是人工劃定的，並非依據民族或地理的自然因素，因此這些中亞回教民族有大量的族人分佈於邊境以外的地區。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有一百萬土庫曼人分佈於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阿富汗；有三至四百萬塔吉克人居住於阿富汗，另有一小部份則居住在中國大陸；有一百五十萬烏茲別克人，居住於阿富汗；有四十萬哈薩克人和將近十萬吉爾吉斯人住在中國大陸。中亞回教民族與境外的族人，在精神和實質上仍維持着不同程度的聯繫。蘇聯政權與中亞回教民族間的關係也因而顯得複雜和微妙^③。

中亞的回教民族不像烏克蘭人或喬治亞人那麼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較易向現實低頭，服從莫斯科的統治。但由於他們獨特的回教文化，使他們更難以被同化，因此他們也比烏克蘭人和高加索人更不為莫斯科所信任，難望在蘇聯社會中得到很好的地位。

二、中亞回教民族之地位

基於中亞回教民族較不受信任，且基於行政管理的需要，斯拉夫族的移民和專業人員便在政府的贊助之下，大量地湧向中亞地區。他們集中於各城鎮，佔據地方政府的要職，掌管監督和建設的各項事務^④。以烏茲別克共和國為例，雖然自五年經濟計劃開始實行後，蘇維埃政權基於需要，任用了一些社會底層的工人、貧農和僱農，因而擴大了烏茲別克人從政的機會，但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下，大部份務農的烏茲別克人的參政機會仍然有限。職位越高，他們的機會也越少（見表一）。烏茲別克人入黨的機會和在黨組織中的地位，也遠不如俄羅斯移民。一九二九年一月，烏茲別克人佔烏茲別克共和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

註② Dan Fisher, "Soviet Muslims Increasing Rapidly, Census Indicate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3, 1980. 雖然韃靼人並非中亞的原始居民，但有大量韃靼人被趕到中亞。

註③ Alexandre Bennigsen, "Soviet Muslims and the World of Islam,"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29 No. 2 (March-April 1980), pp. 39-40.

註④ Gregory J. Massell, "Moderniza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in Soviet Central Asia," in Paul Cocks, et al.,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81.

十六，但他們在該共和國黨組織中的比率僅百分之四十七^⑥。一九四九——六六年間，俄羅斯移民在烏茲別克黨組織中的比率約為百分之三十左右（見表二），而到一九七〇年俄羅斯移民才佔烏茲別克共和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二點五。而從表三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烏茲別克共黨中央委員會局（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中，俄羅斯人一向佔多數，一九七六年，烏茲別克人才以六比五變成多數。再進一步深入探討，中亞部份回教人士雖然在當地黨政組織中獲得一些職位，但仍沒有機會擔當重要的經理任務或掌握政治權力。他們之所以能升到受尊敬而無實權的地位，是蘇聯政府在政治權力以外，基於普遍的標準，對他們論功行賞的結果。在莫斯科的最高決策機構和主管全蘇聯事務的部會中，亦即從政治局委員以至中央委員會委員或中央檢查委員這一系列職位，中亞回教人士即令費盡心思和力氣，亦難以獲得^⑦。哈薩克共和國第一書記庫那耶夫（D. A. Kunaev）雖然由於布里茲涅夫的提拔，以哈薩克人而當上政治局委員，但鑑於哈薩克共和國的居民有三分之二是斯拉夫人的事實，庫氏的政治權力必定是虛空的。他在政治局的地位只是回教少數民族權力的一個假象。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在蘇聯普遍存在的現象，亦即在俄羅斯共和國以外的十四個共和國和國中，表面上，當地民族的人擔任共和國黨組織第一書記，但實際上，直接向莫

表一：一九二八年烏茲別克政府人事概況

層次	行政人員總數	烏茲別克人(%)	其他(%)
共和國	一、一九九	一三八 (一一·五%)	一、〇六一 (八五·五%)
自治州	三、四九七	六三九 (一八·三%)	二、八五八 (八一·七%)
區	一、〇六〇	四四一 (四一·六%)	六一九 (五八·四%)

來源：轉引自 D. Carlisle 之文·見註⑥·p. 251

表二：俄羅斯人佔烏茲別克黨員人數之比率

一九四九年	三九%
一九五二年	三六%
一九六一年	二八%
一九六六年	三一%

來源：引自 D. Carlisle 之文·p. 262.

表三：烏茲別克黨中央委員會局成員

年代	俄羅斯人	烏茲別克人
一九四九	九	五
一九七一	六	五
一九七六	五	六

來源：同表二·p. 262.

註⑥ Donald S. Carlisle, "Modernization, Generations, and the Uzbek Soviet Intellects," in Cocks, et al., eds., 1976, p. 250.
註⑦ 同註⑥·p. 286.

斯科報告的俄羅斯人所擔任之第二書記，地位更重要^⑦。

在軍隊中俄羅斯人也佔主宰的地位。幾乎所有高級指揮官都是俄羅斯人，即使少數指揮官並非俄羅斯人，但還是斯拉夫人，例如烏克蘭人或白俄羅斯人。莫斯科也謹慎地按照種族，編組軍隊。俄羅斯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被分配到最精銳的單位，例如戰略火箭部隊、裝甲兵團、砲兵和前線摩托化步兵等^⑧。

爲了向回教世界輸出無產階級革命，蘇聯刻意把中亞變成一個可供展覽的櫥窗。中亞的建設，包括灌溉系統、交通系統、工業、學校和衛生設施等，與其境外回教國家中的疾病、貧窮和封建狀態相比，呈現強烈的不同畫面。中亞回教民族的文盲減少了不少，生活水準提高了。一位由西方到莫斯科的回教人士坦白說，塔吉克斯坦是蘇聯的一項成就^⑨。這是蘇聯統治中亞有成就的一面，但也有不良的一面。

教育掃除了文盲，同時也培養了一些精英團體。民族自覺最容易產生於這批人之中。誠如魯塞 (B. Russelt) 所說：「識字可以提供一個人比較他目前的地位和別人的地位之標準，因此產生了『期望增高的革命』之潛能」^⑩。中亞精英分子對俄羅斯人統治的挑戰是潛在的，不像民族傳統深厚的波羅的海、烏克蘭或高加索等地的精英分子那麼具體^⑪。馬塞爾 (G. Massell) 提示，中亞人求變的模式之一，是得自被流放到中亞的韃靼人的啓發，沿着種族文化的認同、民族權利和人權的追求之方向前進。鑑於有組織地公然反抗徒招來莫斯科的殘酷迫害，他們並不採取分離主義的路線，來表達他們的挫折或不滿。他們對蘇維埃制度及其權力中心所提出的是，特殊的、自覺的和進取的要求——要求少數民族參與制度的真實的角色和報酬，要求有更廣泛和更有意義的管理地方之權，還可能巧妙地要求莫斯科承認地方性文化中固有的價值，並推展一些傳統的、美學的和民族的活動^⑫。

中亞的經濟成長也有負面影響。中亞的石油和天然氣通常運到歐俄或烏拉山，或者外銷賺取外匯，因此有些回教人會有被剝削之感。烏茲別克斯坦生產的棉花雖佔全蘇聯的四分之三，但其中只有百分之三在當地加工，結果烏茲別克人還須向俄羅斯人購買大部份完工的製成品^⑬。這種情形可能加深中亞回教人民，尤其是精英分子對俄羅斯人的怨恨，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

註⑦ Herbert Meyer, "The Coming Soviet Ethnic Crisis," *Fortune*, August 14, 1978, p. 157.

註⑧ 同註⑦ - pp. 157-8.

註⑨ David K. Willis, "Doorstep of turmoil: quiet life along 'roof of the wor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0, 1979, p. 4.

註⑩ Bruce M. Russett,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 115.

註⑪ 同註⑩ - p. 160.

註⑫ 同註⑩ - pp. 284, 289-90.

註⑬ Sig Mickelson, "USSR Muslim Population Explosion Poses a Possible Threat to Soviet Military," *Military Review*, (November 1978), p. 42.

在宗教方面，回教大體上已成爲一種「私人的事務」(private affairs)。以前由回教履行的一些基本的福利工作已由政府所取代。回教人士必須面臨的問題是，在固守傳統或加入共黨成爲無神論者以求升遷的兩條路中，作一選擇。回教的行政結構也針對蘇維埃制度的現實而改變，旨在求得當局對某些文化特性之容忍。目前中亞大約有三百個清真寺、少數回教高等學校和回教僧侶在塔什干大教長巴巴哈諾夫(Z. Babakhanov)的管理下存在着^④。克里姆林宮還利用這種外觀作爲對外宣傳的工具。通常由巴巴哈諾夫出面，邀請國外代表團到蘇聯作友好訪問，或參加塔什干回教中心所舉行的一些回教國際會議。今年九月便曾在塔什干舉行一次此類型之會議。蘇聯的回教領袖也常到回教國家訪問，特別是到保守的且親西方的回教國家，例如約旦、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突尼西亞。克里姆林宮固然得到回教領袖的合作，但也得作一些讓步，例如減少反宗教的宣傳、允許增加清真寺或出版一些宗教文獻^⑤。

另外，與這些官方認可的寺廟組織同時並存的，有一些蘇聯秘密警察無法充份監視的神秘主義派兄弟會(Sufi Brotherhood)。他們仍固守着傳統的精神學說和神秘儀式。在蘇聯統治者的眼中，他們這羣人除了宣揚宗教復活之外，亦宣揚民族復活，其威脅自然是不容忽視的^⑥。這些團體一旦被發覺，便難逃被迅速撲滅的命運^⑦。

回教運動，不管是自治的或非自治的，其受俄羅斯統治者的不信任和懷疑是必然的。具體的例證是，只有很少數回教人士被派爲駐外代表。中亞回教人口的增加，必然使他們和蘇維埃政權的關係更加複雜。

三、中亞回教民族人口增長的趨勢

過去九年中(一九七〇——七九)，蘇聯全國人口的增加率只有百分之九。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真理報」公佈蘇聯總人口是二億六千二百四十四萬二千人^⑧。比起過去，這十年間蘇聯家庭每年少生一百萬個小孩^⑨。

就過去九年間十五個共和國的人口增加率而言，其前五名爲：塔吉克——百分之三十一，烏茲別克——百分之三十，土庫曼

註^④ Eric Mettler, "The USSR's Colonial Islamic South," *Swiss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March 1980).

註^⑤ 同註^④, pp. 43-4, 46.

註^⑥ Alexandre Bennigsen, "Muslim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to the Soviet Regime," in J. R. Azrael, ed., 1978, pp. 344-5.

註^⑦ 同註^⑥, p. 47.

註^⑧ *Pravda*, April 22, 1979, p. 4.

註^⑨ Boris Vinokur, "Russia Takes a Census—and Goes to War,"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28, 1980.

——百分之二十八，亞美尼亞——百分之二十二，吉爾吉斯——百分之二十。在這前五名中，除第四名外，其餘均在中亞。至於白俄羅斯、烏克蘭及俄羅斯的人口增加率均為百分之六，喬治亞、拉脫維亞均為百分之七，愛沙尼亞百分之八，立陶宛百分之九。由此可知中亞人口增長快速，而大部份由斯拉夫夫人居住的共和國則人口增加緩慢^②。

就各民族人口增長率而言，據費舍(D. Fisher)之報導，一九七九年人口普查顯示，一方面，蘇聯第一大族俄羅斯人的增長率只有百分之六點五，亦即增加八百四十萬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等三個斯拉夫民族加起來的人口增長率才百分之五點八，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則沒有增加。一九七〇年俄羅斯人在俄羅斯共和國中所佔之人口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三點三，一九七九年則降為百分之八十二點六。俄羅斯人增加率最高的地區是摩爾達維亞和白俄羅斯兩共和國。在喬治亞和阿捷爾拜疆兩共和國，俄羅斯人增長率分別減少了百分之六點三和六點九^③。

另一方面，具有回教文化傳統的二十二個民族在一九七〇年人口普查時計有三千四百六十萬人，佔全蘇聯人口百分之十四點三，一九七九年人口普查時增為四千三百一十萬人，佔全蘇聯人口百分之十六點四。換言之，九年間增加了八百五十萬人，增加率為百分之二十五。對比之下，俄羅斯人佔全國人口之比率由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五十三點四降為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二點四，而回教民族則由百分之十四點三增為百分之十六點四。而回教民族中，中亞的烏茲別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庫曼人三個民族在此九年中的總增長率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三。名列蘇聯第三大族的烏茲別克人的增長率尤其驚人，高達百分之五十二點八，增加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人^④。

蘇聯的人口政策是積極地鼓勵生育，想藉此刺激俄羅斯人人口的增長率。一九七四年七月蘇聯政府除了對生育十個以上子女的母親給予「母親英雄」之榮譽外，並開始頒發「母性光榮」獎狀和「母性獎章」。此外，「母親英雄」並享有額外的居住空間，免費渡假，免費乘車和其他特權。她和她的丈夫並可以比普通退休年齡(男的是六十歲，女的是五十五歲)早五年退休。對子女多的大家庭，國家還可按照實際情形，供給每個小孩每月十二盧布(十八點六美元)的津貼。通常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收入少於五十盧布(七七點七美元)者，國家即給予這種津貼。夫妻所得合計三百盧布的一般家庭，只有從第五個小孩起才能得到這種津貼。

但是，政府鼓勵生育所得到的效果與預期的相反，因為事實上成爲「母親英雄」的大都是中亞回教人民。哈薩克斯坦有二萬九千個「母親英雄」，佛龍芝(Frunze)的吉爾吉斯報紙和阿什哈巴德的土庫曼報紙每月都刊載很長的「母親英雄」名單^⑤。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David K. Willis, "Moscow's push to keep the prams rolling,"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0, 1979, p. 2.

中亞民族人口增長率高的原因：一是觀念問題，例如塔吉克人視子女為最重要之財富；二是中亞都市化程度較低。就各共和國城鄉人口比率而言，城市人口比例較高者為：俄羅斯共和國每百人中城市人口為六十九人，愛沙尼亞為七十人，拉脫維亞為六十八人，亞美尼亞為六十六人，烏克蘭為六十一人，立陶宛為六十一人；而城市人口較低者為：塔吉克——三十五人，吉爾吉斯——三十九人，摩爾達維亞——三十九人，烏茲別克——四十一人，土庫曼——四十八人²⁴。由此可見斯拉夫夫人主要居住地和中亞社會結構的差異。大多數中亞回教人民住在鄉下，不會面臨房屋和日用品供應不足的問題，婦女亦無須外出工作，自然不必節育。

四、中亞人口增長的影響

中亞民族人口增長率太高可能帶來的影響可分為幾方面來討論。

1. 在心理上，可能使俄羅斯人與中亞民族間關係更複雜化。維諾可 (B. Vinokur) 曾說，他多次聽到蘇聯共黨中央委員會的一些高級幹部以嘲笑的口吻描述中亞民族是「好吃懶做」的民族²⁵。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俄羅斯人看到這些民族人口的增加，便忍不住要擔心蘇聯人口的「黃化」了。

2. 在政治上，中亞回教民族的人數既然增加，則中亞回教精英分子鑑於沒有進身全聯盟上層權力機構之門徑，必然更迫切要求對共和國之事務，有更多的參與和有真正的管理之權。

3. 在經濟上，未來十年間，蘇聯正面臨青年勞動力減少的現象。蘇聯社會學家別列維真契夫 (V. Perevedentsev) 估計，到一九九〇年蘇聯勞動力的淨增長率將為零。斯拉夫人的增長率遠低於中亞回教民族，使勞力資源的缺乏更形嚴重。原因是，無論以前沙皇的部長或目前克里姆林宮的官僚，他們所屬行的投資計劃都偏向於俄羅斯共和國；蘇聯三分之二的工業產品也都來自該共和國。根據俄羅斯人的出生率來估計，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間，達到退休年齡的俄羅斯人之人數超過進入勞動年齡的人數，因此俄羅斯共和國勞動年齡之人口將從一九八〇年的八千三百八十萬人降為一九九〇年的八千二百五十萬人。而中亞回教民族既非建設共產主義的熱衷者，又寧願守著在家鄉的任何工作，只有在罕有的特殊情況下才願意遷移到別處的工業區。因此蘇聯難以依賴他們來緩和俄羅斯共和國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鑑於過去蘇聯工業中的經濟成長，主要是來自勞動力的增加而非生產率的提高，西方分析家相信，未來十年間，蘇聯經濟成長率將由百分之四降為百分之三點五，甚至百分之三²⁶。

註²⁴ 同註¹⁸。

註²⁵ 同註¹⁹。

註²⁶ 同註⁷，pp. 158, 160。

4. 因人口增加不平衡而產生的最嚴重的影響可能是在軍隊方面。根據徵兵年齡（即十八歲）的青年人數來看，從現在起到西元二千年，非斯拉夫族的新兵比率將從百分之二十左右升為百分之三十三。而且由於俄羅斯共和國勞動力短缺，預料莫斯科將使一些屆滿徵兵年齡的俄羅斯人免服兵役。果如此，則非斯拉夫族的兵員之比率將更高。到那時候，蘇聯可能難免要把一些非斯拉夫族的士兵派到一些較精銳的部隊中，不能像目前這樣把非斯拉夫族人派往較不重要的部隊，而精銳的部隊全由斯拉夫人組成。隨着非斯拉夫人在精銳部隊中人數的增加，語言上的差異不可避免地將使這些部隊的效能大打折扣。只有百分之三的俄羅斯人會說其他民族的語言，而據估計，蘇聯境內大約有五千八百萬人根本不懂俄語或俄語不流利，中等學校畢業生的俄語說讀能力不好是司空見慣之事。雖有百分之十六的中亞人會講俄語，但應徵入伍的十八歲中亞回教青年至多中學畢業，很少會講俄語^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亞人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受完中等教育，教俄語的老師本身俄語程度也差；而且居住在自己的家鄉根本沒有使用俄語之必要。除語言隔閡影響統馭之外，回教民族在軍中的人數日增，更可能對清一色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羅斯人）的指揮系統孕育不滿^③。這種不滿在平時也許尚難察覺，但到了戰時，恐怕便很容易表現出來。

五、結 論

對蘇聯政權而言，目前中亞回教民族的民族意識和宗教復興之威脅並不大，中亞民族在短期內也不可能公然向莫斯科挑戰，但克宮頭子們所感受的潛在威脅也不易消除。而九年來中亞回教人口的增加使得蘇維埃政權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更形複雜。這種對內部民族問題的困擾，容易促使蘇聯對其南疆不穩的威脅，估計偏高，而作軍事冒險。

有位學者以為，蘇聯在人口普查之後不久即悍然進兵阿富汗，目的是想以阿富汗的土地養活漸增的中亞士兵。不過此一看法已隨着在阿富汗作戰的中亞士兵轉由斯拉夫軍隊所取代而不攻自破，因為阿富汗居民的宗教和政治自由對中亞人的吸引必定使蘇聯領袖懷疑阿富汗是否適合中亞士兵駐紮。此外，中亞士兵在阿富汗戰場上的表現，也可說明中亞人在軍中的比例增加，將降低蘇聯軍隊之戰鬥能力。這確實是克宮的隱憂。

中亞人若想進一步要求民族的權利，只會招致俄羅斯統治者強硬的反擊，這是可以預料的。而統治者若想用強制手段迫使中亞人移到別處工業區以解決勞動力缺乏的問題，也可能冒着惹起頑強抵抗的危險。中亞的「斯土斯民」確實是够令克里姆林宮焦慮的。

註② 同註①，pp. 161, 164.

註③ Dalage Mehan,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viet Military," *Air University Review*, (May-June 1980), p. 70.